

# 打造城市的黄金时代——彼得·霍尔的城市世界

To Build City into A Golden Age——The Urban World of Peter Hall

吴缚龙 李志刚 何深静

新世纪伊始，战火纷飞，多极化的全球格局展现出世界政治经济风云际会的斑驳色彩。步履蹒跚里铸造的是一个城市世纪，城市文明的新时代在阵痛里姗姗来迟。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新国际劳动分工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塑造了日益崛起的亚洲尤其是强盛的中国，同样被变革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政治经济结构性调整：从生产的福特制到后福特制，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流，从冷战后的多元合作到今日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制造业普遍衰落，IT经济泡沫在缩水，金融贸易通讯业跨国公司向全球拓展。资本流向东半球的聚积造成了空间资本循环的失血，城市面临更为残酷的竞争环境，如何打造有生命力的城市，城市的未来成为西方政府、媒体和专家普遍关注的焦点议题。

## 1 创新城市与文化工业

今春一个晴朗的傍晚，在英格兰南部美丽的海港城市南安普敦，彼得·霍尔教授受大学和市政府的联合邀请，为市政官员和教职员带来了一场题为“设计创新城市”的演讲，我们应邀出席。霍尔无疑是当代欧美规划大师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作为地理学家和规划师，置身英国泾渭分明的学术界和政界背景之中，真正能够兼收并蓄的人并不多见，霍尔是极少能从学术角度深刻影响政府，直接指导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一位，政府和学界的联合邀请也能体现出他在这一角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组织者的初衷是请霍尔谈谈大学和城市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下如何增强城市的竞争力，但霍尔本人对“创新城市”显然有其独到的见解。围绕他在1998年发表的近1200页的巨著《文明中的城市》，霍尔将城市的活力、创新能力与文化创造力结合起来，纵谈古今，

为在座人员刻划了一幅西方核心城市在文化轨迹下发展的长篇画卷。其核心主题是：一种新的力量——城市文化的力量正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而日益占据城市经济发展的主流。从创新角度，霍尔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城市历史划分为3个时代：技术—生产创新(technological-productive)；文化—智能创新(cultural-intellectual)，以及文化—技术创新(cultural-technological)。第一波技术性创新的城市如177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的工业革命，184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的机器工业和1870年代德国柏林的工业技术设计和创新；第二波文化—技术创新如1920年代美国洛杉矶好莱坞的出现，1955年代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猫王李维斯对音乐工业的革命性影响等等。城市技术、智能创新造就了一座座曾经伟大的世界城市。当前，新的文化工业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和创新方向。新一波的城市创新表现为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以互联网技术为物质基础，以新的含有附加价值的服务业(new value-added service)为支撑。他预见新的创新性中心城市将出现在三种城市中：历史悠久的大都市，如伦敦、巴黎、纽约等；阳光地带怡人适居的都市，如温哥华、悉尼等；复兴中的老城市，如格拉斯哥、纽卡斯尔等等。

的确，当代西方城市的新经济时代正日益朝向文化工业的方向发展，并逐步占据经济发展方向的主体。早在1998年，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数据就显示出，在这一包含广告、建筑设计、艺术古董、音乐制造、出版等数十个行业的新领域，其就业总人口已高达百万，其人均工业输出已达近6万英镑的惊人数量。新的创新点在于旧城中心区新文化工业的出现和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城市空间和城市经济的复活带给城市新的生命力。不过，霍尔也指出这一发展方向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如旅游产业的消极创新往

作者：吴缚龙，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地理系，博士。f.wu@soton.ac.uk

李志刚，何深静，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地理系，博士生。z.li@soton.ac.uk, s.he@soton.ac.uk

往伴随着城市文化和空间的单一和死板,易出现建筑的模仿复制,以至于城市没有了可识别性。这一认识贴切地体现了西方城市研究近来新的焦点,即所谓新经济空间(new economic spaces)的出现,如Allen Scott对城市文化经济的研究(Scott 2000),Florida对创新阶级(creative class)的研究(Florida 2002),Andy Pratt对英国新媒体工业的研究等(Pratt 1997)。特别是Hutton最近对于西方内城新经济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描绘了在“.com”经济坍塌之后,以设计、广告创意等创造性和知识性为基础的新经济活动正在为伦敦、温哥华、西雅图等城市带来新鲜血液,新的社会空间正在形成(Thomas 2004)。

## 2 城市未来的生与死

新经济增长点的出现体现了城市强大的生命力。“诸位都通过互联网接收e-mail信息来这里参加这个演讲会,但我们需要面对面才能使它富于活力地完成”,这一简短的话语点明了霍尔对于城市未来的看法:中心集聚仍将存在,并且会与信息高速公路互补地共存下去。

“(城市集聚)到了尽头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夸大的说辞”(Hall 2003)。在他看来,通讯技术的发展虽然降低了人类联系通勤的成本,但同时也大大刺激了人类经济活动中进行直接交往的欲望和面对面的需要,集聚效应大于分散效应。与萨森的看法相同(Sassen 2001),他认为控制型的经济跨国公司集团需要集聚以实现信息的高效调控,以信息制造、传递和消费为特征的新服务业需要方便可达的劳动力,这些都是空间集聚存在的源泉。源泉既存,中心城市的生命即在。但空间的发展永远存在竞争,技术进步同样带来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此消彼长。远程通勤、远程工作等会使多中心边缘城市的开发成为可能,传统城市中心将依靠历史基础与之长期竞争,而新文化产业的时空分离性将决定这场竞争的结果:不同层次的商业中心、边缘城市、远距离边缘城市和专业化的城市(以体育、会展、主题公园等为核心)将构造新的富于活力的多中心城市。

另一方面,在20世纪后期废弃的制造业基地和国际移民聚居区等形成新的“灰色空间”,空间与社会问题结合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异(Fainstein等 1992; Mollenkopf和Castells 1991)。萨森(Sassen 1991)对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纽约、伦敦、东京的研究表明了跨国精英和服务业劳动力的社会极化趋势:社会经济构成的两端出现膨胀而中等收入人群在减少。城市空间的变化被界定为“碎化”(Marcuse和Van Kempen 2002)和“分割”(Fainstein等 1992):防卫型社区(gated community)(Wyly 1999)和“下层阶级”聚居区(underclass ghetto)(Wilson 1987)形成新的城市空间的两极。从这一点上来说,未来大城市将会在通讯技术和城市功能扩散中继续存在下去,但将会不那么健康。真正得益的将是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和中小城镇,良好的就业环境、比较均质的人口构成,以及与大城市优良的通勤基础,将为这些新兴地带来无限活力。

## 3 世界体系与世界城市

城市和城镇体系变化决定了新的全球视野下的区位观,新的世界体系在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城市研究的核心。著名的“世界城市”的假设最初源自弗里德曼和沃尔夫(Friedmann和Wolff 1982),他们界定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管理功能(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金融功能的强化,以及创新经济活动的集聚等使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城市置身于全球城市等级的最高端,在全球尺度上发挥功能。一般认为,包括伦敦、纽约、洛杉矶、东京、巴黎、柏林、悉尼和亚洲的新加坡、香港等大约30多个这样的城市属于这一群体,近年来北京和上海的发展也已使之进入世界城市研究的视野。对全球城市最具影响的研究是萨森(Sassen)对于纽约、伦敦和东京的考察,在其名著《全球城市:纽约、东京、伦敦》中,她系统地阐述了这三座城市在金融、贸易业基础上建立的全球城市地位,跨国公司精英、移民等在这些城市集聚,在职业构成的变化上,制造业的衰落伴随了金融贸易业的膨胀和随之产生的餐饮、洗涤、服装等服务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化的职业构成。萨森将这一职业变化趋势与社会构成相联系,断言全球城市的社会空间将是“沙漏”型的极化形态,两头大中间小(Sassen 1991)。“全球/世界城市”假设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它揭示了城市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弗里德曼和萨森几乎以个人之力全面扭转了新马克思主义沉寂后城市研究的衰落趋势,将其引入全新境界。之后,1990年代以来对全球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全球城市的特征、全球城市的评定和全球城市管理管制三方面,比较突出的包括在彼得·泰勒(Peter Taylor)领导的“GaWC”组织对全球城市网络的定量划分(Taylor 1995),霍尔对全球城市性质的研究(Hall 1996),阿布-拉格特(Abu-Lughod)对美国背景下的全球城市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比较研究(Abu-Lughod 1999),以及汉姆莱特对全球城市社会极化问题的辩论(Hamnett 1994; 1996)等。

全球城市假设的核心在于认为全球化经济影响下这类城市得以超越民族国家的影响,在全球尺度上发挥控制功能。但近年来对于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和管制下全球城市的研究表明,国家管理、民族文化和历史对于这类城市的影响并不一定如假设所言,该假设被置疑过于依赖美国城市背景和少数城市的特殊性,不同政治国家背景的影响未能体现出来。从这一点而言,弗里德曼曾提到这一假设也许在未来最终将被放弃(Friedmann 1995)。必须肯定的是,这一假设大胆地将城市置于全球等级网络的视角之下,联系全球化全面重新审视城市的功能、等级、社会和空间,无疑为认识和理解城市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作为与卡斯代尔(Castells)、弗里德曼(Friedmann)和哈维(D. Harvey)齐名的大师,霍尔对全球城市的理解与他们一脉相承。这批历经了1960年代社会激变的学者深受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

菲伯夫(Lefebvre)的影响,将城市空间的变化视为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反映,强调将空间变化与不同空间尺度乃至全球尺度的资本循环和经济社会变迁相联系(Lefevre 1991)。霍尔认为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化的出现使生产和创新在全球扩展,为新的全球等级网络结构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他非常强调历史对于城市现实和未来的影响,强调不同区域的差异性。

#### 4 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

同时身为地理学家和规划大师,霍尔深刻理解城市规划的学术脉络和前景未来。在《明天的城市》一书中,他曾详尽地阐述了他对过去、当代和未来城市规划的看法(Hall 1988)。二战以前的城市规划主要以形体物质规划为特征,城市规划教育人员同时是规划师、设计师和景观设计师,建筑设计被扩展到城市尺度即可誉为规划。一旦规划图纸完成,城市即被视为可以如房屋般创造出来。1960年代计量革命的影响使多种背景的人员开始进入规划界:经济学、地理学、数学、系统分析等开始为规划发展全新的范式。城市规划被视为科学而不仅是制图,系统的计量分析开始引入规划的制定中。而1960年代同时发生的城市危机和种族问题等更使规划师对社会问题开始重视,他们开始反问“规划什么样的城市?为谁制定规划?”等问题,这为城市研究新范式的发展和19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铺就了道路。基于阶级分析的城市理论遍布整个1970年代。但是,当代后现代城市的理解更多依赖定性和定量融合的改良状态,缺少具有深度的理论支撑,对城市的认识再度陷入沉寂之中,城市研究与城市规划设计不幸脱节。在霍尔看来,今天的城市研究纯粹讨论圈中的理论问题,很少考察具体的规划实施,而规划设计人员同样漠视深层的理论研究,埋首实际的工程设计。因此他倡导规划人员和研究者的融合,倡导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而他自己正是此中写照。作为30多本专著著者,他是伦敦大学学院(UCL)的规划教授,曾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划系主任,他是院士,是1995~1999年度英国城镇规划协会的主席。作为规划专家、爵士,他是英国政府环境战略规划的顾问,是副首相顾问团成员,是伦敦铁路轻轨的规划咨询人,是伦敦空间经济研究的顾问,是世界多个城市政府的规划顾问,并曾于2002年到中国参加长江三角洲发展的国际研讨会。

在《文明中的城市》的结尾,霍尔预言城市的黄金时代正在来临。文化工业的兴起,全球城市的发展,都表明了城市文明将在信息时代继续。同时,三大问题正凸现为未来城市的主题:交通技术和可持续的城市主义,更加不公平的城市世界,以及逐步变化中的经济、家庭和市民社会(Hall 1998)。快速发展下的中国无疑也将汇入这股城市潮流,辉煌与瑕疵并存,成功与失误同在。市场经济下更为异质的社会存在和城市空间对规划师的自身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发展是快速多变的,城市现象是系统复

杂的,城市社会空间与规划的互动是纷繁的,但是霍尔预言的伟大城市时代应是一种召唤,一种呼喊。可以预见,在我们面前,西方与东方,历史与未来,我们的城市将在新世纪的金色光芒里走向新的文明。

#### 参考文献

- Abu-Lughod (1999). New York, Chicago, Los Angeles America's Global Cit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ainstein, S. S., et al., Eds. (1992). Divided Ci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Blackwell.
- Florida, R.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Friedmann, J. (1995).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P. Knox and P. J. Tayl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47.
- Friedmann, J. and G. Wolff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6(3): 309-344.
- Hall, P. (1996). The Global City, UNESCO.
- Hall, P. (1998). Cities in Civilizati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urban orde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Hall, P. (2003). The End of the City? 'The report of my death was an exaggeration'. City 7(2): 141-152.
- Hall, P. G. (1988).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UK; New York: Blackwell.
- Hamnett, C. (1994). Social Polarisation in Global Cities: theory and evidence. Urban Studies 31(3): 401-424.
- Hamnett, C. (1996). Why Sassen is Wrong, a Response to Burgers. Urban Studies, 33(1): 107-110.
- Lefe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 Marcuse, P. and R. Van Kempen (2002). Of States and Cities: The Partitioning of Urban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llenkopf, J. and M. Castells (1991).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Pratt, A. (1997).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Produc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employment change in Britain, 1984-1991.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 (11): 1953-1974.
- Sassen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A. (2000).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London, Sage.
- Taylor, P. J. (1995). World Cities and Territorial Stat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ir mutuality.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P. L. Knox and P. J. Tayl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0.
- Thomas, A. H. (2004). The New Economy of the Inner City. Cities, 21(2): 89-108.
-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yly, E. K. (1999).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Restless Urban Landscape. Economic Geography 75(4): 309-338.